

文苑笔谈

趣话“九九消寒图”

冬至，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一。古人认为：“冬至，阴阳百物之始，日极南，影长，有履长之庆。”此日，皇家行“腊祭”之礼，官府与民间亦各相庆贺，称为“冬节”，因而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。

“一阳初起处，万物未生时。”冬至被视为阴阳转换、冷暖交替的转折点。古人常以“数九”来记录冬日寒意渐消的过程，这一习俗最早见于南朝荆楚地区，即“从冬至次日数起，至九九八十一日，为寒尽”。江浙一带则从冬至日数起，故有“春打六九头”之说。这种朴素的生活智慧，经过百姓口耳相传，逐渐凝练为朗朗上口的“九九歌”。早在南宋时便已有“一九与二九，相逢不出手”的民谚。我国幅员辽阔，各地传诵的“九九歌”各具特色，如北方民谣所唱：“一九二九，沿河看柳；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；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。”在这漫长的“数九”寒天，古人还创造出一种雅致的迎春方式——九九消寒图。

相传此图为民族英雄文天祥所创。南宋祥兴二年(1279年)，文天祥抗元失败，被囚于大都(今北京)狱中。适逢冬至，为计时遣怀，他于狱壁之上画寒梅一株，枝缀九朵，每朵九瓣，每日染红一瓣，待满树皆红，便是春回大地之日。红梅

傲雪，既喻文天祥的高洁之志，更寄托着他内心深处的国破家亡之痛与“还我河山”之盼。

这种“画九”的风雅习俗自元代起得以传承延续。元代杨允孚《滦京杂咏》有诗云：“试数窗间九九图，余寒消尽暖回初。梅花点遍无余白，看到今朝是杏株。”又注：“冬至后，贴梅花一枝于窗间，佳人晓妆，日以胭脂图一圈，八十一圈既足，变作杏花，即暖回矣。”足见此风俗已融入闺阁日常。

现存最早的九九消寒图为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的明代刻版拓本。这幅图的中央绘有一只胆瓶，插素梅一枝，共八十一瓣。四周环绕十格，正下方的一格绘有三童子与驮瓶山羊，取“三阳开泰”“太平吉祥”之意；其余九格分绘不同时令的景物，各配一诗。最后一格“九九”诗曰：“满园桃李斗妆新，粉蝶黄蜂往复频。紫陌东风游骑远，信知人与物皆春。”图末题跋“大明弘治纪元岁次戊申秋七月”，即公元1488年，距今已有五百余年。据刘若愚《明宫史》记载，司礼监每年冬至都要印“九九消寒”诗画，“每九诗四句，自‘一九初寒才是冬’起，至‘日月星辰不住忙’止……不知缘何相传，年久遵而不改”。可见其制式统一、流传已久，俨然成为宫廷年俗。只可惜刘若愚视其为“瞽词俚语”，未录全诗，今人难



故宫养心殿燕禧堂陈设复原场景，其中悬挂的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题字，是清代宫廷“写九”式九九消寒图，为清光绪时消寒的传统风物。

窥其详。明末《帝京景物略》记有两种消寒图形制：其一为“画梅法”，即“日冬至，画素梅一枝，为瓣八十有一，日染一瓣，瓣尽而九九出，则春深矣，曰‘九九消寒图’”；其二为“画圈法”，即“有直作圈九从，丛九圈者，刻而市之，附以‘九九之歌’，述其寒燠之候”。后者因“歌图合一”，兼具时令记录之用与歌谣传唱之趣，故流传尤为广泛。

与“画九”相似的还有一种“写九”的文墨游戏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幅葫芦形消寒图，全诗每四句诗写一九，共三十六句二百五十二字，依诗句顺序绘成葫芦形

图案。诗文从“头九初寒才是冬，三皇治世万物生”写到“三桂令兵下南去，我国大清坐金銮”，可推知该图制于清初顺治年间。尤为特别的是，图中“雁南飞戛柳芽待春来”中的“雁”“芽”“来”都不是九画，但这九个字的繁体字笔画之和为八十一画，已初具“九九消寒句”的雏形。道光初年，据吴振械所著《养吉斋丛录》记载：“御制‘九九消寒图’，用‘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’九字，字皆九笔也。懋勤殿双钩成幅，题曰‘管城春满’。”此处巧用韩愈《毛颖传》中的毛笔雅称“管城子”的典故，寓意笔墨书春、满城芳华。该图至今仍悬于故宫养心殿燕禧堂内。另有一幅御制“春前庭柏风送香盈室”消寒图，双钩字内不仅填满朱色，更以细笔随形记注天气，长短笔画间巧妙安排文字，读来趣味盎然。

清末，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载：“消寒图乃九格八十一圈。自冬至起，日涂一圈，上阴下晴，左风右雨，雪当中……此事予儿时曾为之。”让廉《京都风俗志》中亦有“每日分阴晴，涂一圈记阴晴多寡，谓之‘九九消寒图’，以占来年丰歉”之句。有歌诀曰：“上阴下晴雪当中，左风右雨要分清。九九八一点尽，春回大地草青青。”如此日积月累，即成一份翔实的冬日气象档案。另据单士元《小朝廷时代的溥仪》及清宫档案记载，溥仪儿时曾用“寒梅吐玉”“管城春满”及“消寒益气歌”等消寒诗，其所编词句多记录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诸事，如“冬至头九天气寒，项城有意坐金銮。中华帝国号洪宪，施行专制改江山”“九五未登身先丧”“黎大总

统掌兵权”等句，反映了当时政局的变幻。

民间版本的消寒图，则充满朴拙的生活气息。天津杨柳青、河北武强等地，均将这一传统融入木版年画创作。例如杨柳青年画中有一幅“娃娃图”，图上的童子手举九枚铜钱，上写“原是活财神来到咱家”，其中“原”“财”“来”等字(繁体)写法均有调整，皆为凑足九画，构思巧妙；另有一幅“娃娃戏”，图上的七名童子或摇旗呐喊，或舞枪弄棒，所演正是《洪洋洞》《破红洲》《南阳关》三出经典戏文。戏名也特意选用双钩九画字，别具新意。河北武强年画“九九消寒农历图”，主体为三个小娃娃，周围环以十二生肖，四角饰四季花卉，娃娃手中分别拿着苹果、桃子和柿子，代表平安、长寿、如意。宁河一带则流行以八十一枚铜钱图案连缀成图，填涂规则与记录天气的消寒图相仿。农家常把消寒图与黄历一同贴在灶头，每日点染一笔，成为寒冬里温暖的仪式。这些各具巧思的创作，赋予了消寒图驱邪纳祥、丰收富足的美好寓意。

此外，文人之间还流行一种“九九消寒联”，每联九字，每字也是九画，每日在上下联各填一笔，联成而九九尽。这实际上是由“九九消寒句”扩展而来，民间又称之为“数九迎春联”，如“幽柏玲珑浓荫送秋残，柔柳轻盈香茗贺春临”“春泉垂垂柳春染春美，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”“故城秋荒屏栏树树荣，庭院春幽扶巷草重茵”等。据统计，汉字中九画字最多，约占11.1%，这为构思消寒句或消寒联提供了丰富素材。

书评

卡夫卡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提到：“一本书必须是一把斧头，劈开我们内心冰封的海洋。”当我合上陈伟军所著的长篇小说《神鸟的岛屿》，恍然惊觉，这把斧头早已劈开了我心中那片封冻已久的海域，让温暖的海风裹挟着神话之鸟的鸣叫，在血脉深处掀起经久不息的波澜。

今年是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提出20周年。这本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的《神鸟的岛屿》，是青年作家陈伟军的又一力作。小说以中华凤头燕鸥保护的真实事迹为蓝本，将“硬核”科普与少年成



《神鸟的岛屿》

阅评

周永年(1730—1791)，字书昌，济南历城人。他是清代响当当的读书人，著名的藏书家，也是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创议人。周永年青年时代即嗜读书与藏书，后任翰林院编修，协助纪昀(纪晓岚)编纂《四库全书》《四库全书》编成后，由纪昀编撰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及《简明目录》，周永年分担释家、道家典籍提要的编写。

周永年把藏书当作人生的最大快乐。据《续修历城县志》记载，周永年“方四五岁时，过书肆，逮出荷囊中物，购《庄子》”。周永年小小年纪就把自己攒下来的钱用于购书，多么难得啊！后来，周永年在泮源书院读书，更加喜爱购书和藏书。主讲沈起元对他非常赏识，称赞他：“其文矫然，其气凝然，百无嗜好，惟嗜书。历下书不易得，生故贫，见则脱衣典质，务必得，得则卒業乃已。”周永年的书斋称“水西书屋”，由他自己亲笔题写，并自编藏书目录，此时周永年的藏书已有五万多卷。

乾隆三十六年，周永年中进

长巧妙相融，以少年视角反映生态保护主题，可谓匠心独运。

中华凤头燕鸥的学名为黑嘴端凤头燕鸥，它是世界极度濒危鸟类、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，由于极为罕见、踪迹神秘，这种鸟类被称为“神话之鸟”，全球仅存200余只，每一只的生死都牵动着整个生态系统的神经。中华凤头燕鸥在陈伟军笔下被赋予双重神性：既是自然界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，又是照亮人类精神荒原的明灯。陈伟军以无比细腻的笔触，将这个背部与翅膀晕染灰蓝、头顶着黑色冠羽的精灵，描绘得如此鲜活灵动——它们“矫健地翱翔于天际，显得那样轻盈飘逸，一如荣耀归来的王者”。但陈伟军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并未将笔墨停留在物种保护的表面叙事，而是以神话之鸟为棱镜，折射出更为广阔的人性光谱。

小说中那群守岛人，何尝不是另一种“神话之鸟”？哥哥江大鹏从西北黄土高原奔赴东海荒岛，将青春钉在潮起潮落的礁石上；朱同教授穷尽一生追寻中华凤头燕鸥的踪迹，即使记忆被阿尔茨海默病蚕食，仍记得“要去宁波，去韭山列岛”；叶伯放放弃城镇生活，重返无人海岛，只因“守岛更是守家”的朴素信念……这些人物让我想起里尔克在《杜伊诺哀歌》中的诤

问：“如果我们消失了，何处安放这些无家可归的事物？”陈伟军给出的答案是：在人类永不熄灭的守护意志里，在江大鹏们“青年与海”的誓言中……

少年江小鹏的成长轨迹，恰似一面映照当代教育困境的明镜。这个来自兰州的小学生，怀揣着对大海的蓝色幻想登上铁墩岛，却在晕船呕吐、蚊虫叮咬、老鼠蛇虫的连环考验中，完成了从“被保护者”到“守护者”的精神蜕变。当他将新生雏鸟命名为“鹏飞”，当他颤抖着为受伤的燕鸥解开渔网，当他顶着暴雨修补漏水的屋顶——这些细节组成的，不正是中国少年最稀缺的生命课程吗？同样，作者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直抵灵魂深处的问题：当马睿们被囚禁在补习班的牢笼里，对着手机屏幕羡慕“另一个少年在看你看到的海”时，我们的教育是否正在批量生产着“看不见神话之鸟的眼睛”？

书中最令人动容的，还有海峡两岸的守护者谱系。台湾女孩林芊芊继承外公朱同的遗志，用画笔记录神话之鸟的每个瞬间；她的母亲朱与蓝博士扎根海岛，将燕鸥招引技术从理论变为现实……当林芊芊与江小鹏勾指起誓“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”时，那稚嫩童声何尝不是对两岸共同文化基因最



中华凤头燕鸥(图片来源:浙江省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)

纯净的诠释？

《神鸟的岛屿》最动人的力量，在于它揭示了守护的本质——不是悲壮的牺牲，而是日常的坚持。江大鹏们日复一日地清理水池青苔，月复一月地记录燕鸥数量，年复一年地修补被台风摧毁的设施……这种坚持，恰如“神话之鸟”年年往返于繁殖地与越冬地的漫长迁徙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只有生死相托的承诺。陈伟军通过叶伯伯之口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“当很少有人愿意做某件事的时候，那么这件事就更值得去做了。”这句话像

一记重锤，敲打着每个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的现代灵魂。

掩卷细思，《神鸟的岛屿》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の隐喻吗？当全球生态系统如铁墩岛般脆弱，当传统文化似中华凤头燕鸥般濒危，当纯真童心像海沙上的足迹般易逝，我们是否也需要建立自己的“观鸟屋”，在喧嚣中矢志守护那些易碎的美好？这部作品给出了温暖的答案：只要还有人在乎，神话就不会终结；只要还有孩子能看见燕鸥起舞，希望就永远在浪花间闪烁。

周永年的藏书、修书与读书心法

刘广荣

士，开始其京官生涯。当时北京大大小小的书肆很多，尤以琉璃厂一带最为有名，“内城福隆寺，遇会期多有卖书者”，这些庙会的书摊往往出售不全的零本书，价格低廉，如果想要凑全，需要不断跑去搜罗。周永年的好友、青州藏书家李文藻此时也在京城，两人常结伴去书肆淘书。据李文藻《琉璃厂书肆记》记载：“吾友周书昌遇不全者亦好买之。书昌尝见吴才老《韵补》为他人买去，怏怏不快。老书(书肆商人)云：‘邵子湘《韵略》已尽采之’，书昌取视之，果然。”《琉璃厂书肆记》又载：“朝食后即至厂，手翻至晡，间有典衣买之者。”周永年前往琉璃厂买书，一去就是大半天，翻阅后觉得书值得买，但带的钱不够，就典当衣服。周永年前往德州书院讲学，“出门每以五车(书)自随”，其藏书之多可见一斑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周永年去世后，由于生前刻印图书欠下一屁股债，很多书被拿去抵债，藏书所剩无几。

早年间，周永年和桂馥在济南

五龙潭畔创办了藉书园(又作借书园)，这是我国公共藏书与开放阅览机构的早期雏形。藉书园中有周永年的藏书近十万卷，另加桂馥的全部藏书，规模不小。这个藉书园，既可以供自己学习，又为他人阅读研究提供了方便：“聚书其中，招致来学”“寒士则供其食饮”“极寒者并量给束脩，免其内顾之忧”。可见，藉书园为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。

周永年编纂图书的经验也十分丰富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，乾隆招三百余位才子撰修《四库全书》，总纂官为纪昀，分校官为周永年、戴震、邵晋涵三人。周永年“目尽九千巨册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”，几乎以一人之力，将《永乐大典》通校了一遍，辑出宋刘敞《公是集》、刘敞《公非集》、苏过《斜川集》等十余种重要文献。无怪乎《清史稿》会对周永年作出高度评价：“四部书、衣、农、术、数诸家，钩稽精义，褒贬悉当，为同馆所推重。”

周永年的主要成就乃藏书、建藉书园、编纂图书。他低调做人，

少有人专著传世。所幸，他编撰了《先正读书诀》一书，为后世读书人树立了榜样。

《先正读书诀》是周永年饱览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的著作后，博采众长总结而出的读书方法和经验。全书采集荀卿、朱熹、韩愈、欧阳修、苏东坡、黄庭坚、范仲淹、宋濂、黄宗羲、顾炎武等三十多位名人的著作46部，分为192条，其中选择最多的是朱熹、陆陇其、陆世仪三人的作品。周永年在《王大准序》中说：“世之学者，或失驰骛，或失隐怪而拘迂，矧急功名、营利禄、囿风气、好辨难耶！于戏，读书而能识圣贤要旨，味经史精腴，通古今常变，正国家经权；穷则著为文章，达则政行利济，岂易学哉！岂易学哉！”他希望青少年读书切勿急功近利，要懂得国计民生。

周永年对朱熹的读书方法津津乐道。比如，朱熹说：“读书之法，须是从头至尾逐句玩味。看上字时，如不知有下字；看前句时，如不知有后句。看得都通透了，又却

从头看此一段，令其首尾贯通。然方其看此段时，亦不知有后段也。如此渐进，庶几心与理会，自然浹洽，非惟会得到圣贤语意味不差，且是自己分上身心义理，日见纯熟。若只如此匆匆检阅一过，便可随意穿凿，排布硬说，则不惟错会了经意，于自分上亦有何干涉邪？且如看此幅纸书，都不行头直下看至行尾，便只作旁行横读去看，成何文理？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十)

朱熹认为，读书不可贪多，要精熟。他主张读完一本书，再读另一本书，不要泛泛而读。读一本书时，要耐住性子，逐章逐节地读，理解了前面的章节，再读后面的章节，这样就不会断章取义。读书亦要从易到难，由浅入深，不要囫圇吞枣。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获不大，主要是读书不够“熟”和不够“精”。

周永年对陆陇其的读书方法也很赞同——读书与做人，不是两件事。将所读之书，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，便是做人的法。如此，方叫得能读书人。

到了汝城，才知道从前多少有点小看它了。

汝城县与赣南崇义县相邻，隶属于湖南省郴州市。我此番前来，主要是想寻觅理学鼻祖周敦颐的些许遗踪。此前问过崇义的朋友，汝城有什么值得一去的地方。但他们能说的并不多，甚至对周敦颐一无所知——这其实也不难理解，如今能坚持阅读的人本就不多，普通人对周敦颐的印象，多半只停留在学生时代语文课本里的只言片语，至于背后更深层的历史脉络，自然鲜有探究。

厦蓉高速公路通车后，从赣州到汝城，竟比去本地不少县城还要便捷。车子刚下高速公路，便看到一块“理学名城”的大型广告牌。如此看来，汝城对周敦颐这一人文资源的挖掘与重视不言而喻，但没有搁置“理学”这篇文章，反而大有深耕细作、追本溯源的意思。汝城确实有理由深耕周敦颐这一文化资源。北宋仁宗时期，周敦颐曾在此任县令四年，彼时的汝城，还叫桂阳县。

周敦颐是理学开山鼻祖，在他曾任职的地方，若不发掘理学这一文化名片，未免可惜。不过在我看来，最具资质打出这张文化牌的，当数赣南的大余县。这个地方素有“周敦颐的起点，王阳明的终点”之称：周敦颐曾在这里开宗立派，收下日后对发展理学起了重要作用的程颢、程颐两兄弟为徒；而在理学发展史上声名卓著的王阳明，最终病逝于大余。我想，赣南的相关地区应该增强几分文化发掘的紧迫感。

周敦颐是理学开山鼻祖，在他曾任职的地方，若不发掘理学这一文化名片，未免可惜。不过在我看来，最具资质打出这张文化牌的，当数赣南的大余县。这个地方素有“周敦颐的起点，王阳明的终点”之称：周敦颐曾在这里开宗立派，收下日后对发展理学起了重要作用的程颢、程颐两兄弟为徒；而在理学发展史上声名卓著的王阳明，最终病逝于大余。我想，赣南的相关地区应该增强几分文化发掘的紧迫感。

周敦颐流传后世的诗文总计不过六千余字，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，究其原因，除了作品本身质量高以外，更在于他的弟子成就卓越，将他的学说发扬光大。由此可见，一个人即使学识渊博，也需善于传道授业。有了优秀的继承者，其思想与学说才能代相传。纵观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大家，如孔子、王阳明，皆是如此。试想，若没有弟子的追随记录与传承阐发，又何来《论语》《传习录》这样的传世经典呢？

展厅以周敦颐的生平为主线，突出本土元素，包括湖湘文化对汝城的影响等内容。对普通读者来说，周敦颐的作品当中，《爱莲说》的影响力也许是最大的。今人讲廉洁，往往喜欢引用它。书院专设一个“廉政与法治”展览，陈列了廉政图文、廉政家训、廉史廉事、法治故事等展板。濂溪书院对面的山下，是濂溪公园。全国多地建有濂溪公园，基本上都是后人为了缅怀周敦颐而修建的休闲之所。虽说这些公园与周敦颐本人并无直接关联，但借他的名号，便多了一条传播他的事迹与思想的途径。公园里有几个小朋友在玩要，有个孩子甚至爬到正中那块刻有公园名字的大石头上去了。此刻，他们或许对公园承载的文化内涵懵懂无知；但等他们长大成人后，说不定某天会想起，自己从小就知一个“周敦颐”的人物，知道他的诗文，知道他的事迹……

这便是文化的熏陶，它如同空气般悄然无声，却时时刻刻浸润着我们的生活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。

县城还有一处少见的景观，是一座巍然耸立的古塔。平日里所见的塔多建在高地上，这座塔却建在平地。塔名“文塔”，始建于明成化五年(公元1469年)，现存建筑为清光绪年间重建。“文塔”一名，顾名思义，是为振兴文脉而建，寄托着当地人希望家乡多出文士的期许。重视文化的地区是充满希望的。从长远看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文化的力量最是持久。这座塔高七层，青石为基，青砖至顶。九塘江与寿江在塔旁交汇，水面不宽，有桥沟通两岸。塔下人气甚旺，大家各得其乐，相处融洽。

有意思的是，当地最初建塔是为了培育人才。可到了清代道光年间，人们却因科举考试失利，迁怒于这座塔并将其损毁，直至光绪年间，才在现址重建。事实上，一个地方的文风兴替，从来与塔无关，更重要的是文化氛围、教育方式。周敦颐同时也是教育家，他每到一处，都十分重视兴学育人，对当地的风气教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反观一些文化底蕴薄弱的地区，往往长期缺乏知名的文化贤达到访讲学。由此可见，言传身教的力量最为直观。汝城虽是一个山区小县，历史上却涌现出不少有影响力的人物。以古代为例，明代曾任两广总督、太子太保的朱英，曾任监察御史、福建布政使的范辂(县城的绣衣坊便是为范辂而建)，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在当代，这里走出了开国上将朱良才、李涛，还有诗人朱子奇等。人们常说一个地方“人杰地灵”，其实与当地积淀的深厚文化风气不无关系。

汝城文气，润泽千秋。离开小城时，我不禁回头多看了几眼。如果有机会，这个看似平常的地方，还可以再次探访。



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濂溪书院(图片来源:红网时刻)

汝城文气

李伟明